

SHICHANG JINGJI YU ZHENGZHI JIAZHI
DANGDAI ZHONGGUO ZHENGZHI JIAZHI ZHUANXING YU JIANGOU YANJIU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与建构研究



王永志 著



人民出版社

DANGD

II
ANGOU YANJIU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与建构研究



王永志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伟

封面设计: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与建构研究/王永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01-017179-1

I. ①市… II. ①王… III. ①政治体制-研究-中国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757 号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

SHICHANG JINGJI YU ZHENGZHI JIAZHI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与建构研究

王永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7179-1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的辩证关系	35
第一节 政治价值的社会经济基础	35
第二节 政治价值的市场经济塑造	54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对立统一	71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嬗变与转型	77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嬗变	77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迷失	122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转型	144
第三章 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政治价值震荡与冲突	158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多元化	158
第二节 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政治价值冲突	168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危机	200

第四章 当代中国多元政治价值的调适与整合	217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失范	217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的调适	228
第三节 当代中国多元政治价值的整合机制	237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选择与建构	254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现实选择	25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 基本取向	266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市场经济规定 ..	277
结 语	292
参考文献	304
主题索引	325
后 记	327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大转型和大发展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表征。改革开放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已经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而重大的历史课题。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和资源状况,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能照搬他国经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通过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社会转型的基本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路。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包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能否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既定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一个曲折的

历史过程,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全面的转型,它不仅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革,而且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要考察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就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而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从历史、逻辑和多维视角全面考察不同层面和领域的社会变革。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注意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毋庸置疑,第一种形式的变革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而言的,侧重于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反映着经济层面的变化规律;第二种形式的变革是从社会意识的角度而言的,侧重于强调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反映着政治层面的变化规律。应该说,无论是第一种形式的变革,还是第二种形式的变革,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内容,都体现着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对矛盾体,它们共存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承认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不承认政治层面的变革,或者只承认政治层面的变革而不承认经济层面的变革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除了要进行具体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分析之外,还要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抽象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把两者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去考察。

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①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面临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发展趋向来看,这一历史任务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能回避的。因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大背景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加入世界现代化的行列,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积极“走出去”,主动加强国际交往,参与国际竞争。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任务,从根本上规定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规定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准和立足点,那么我们所得出的所有论断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丝毫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所取得的新发展、新突破和新飞跃,归根结蒂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由

^① 参见 Yunxiang Yan, “Managed Globalization: State Power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in China”, in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eter Berger & Samuel Huntington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2, p.36.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此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经济层面变革的集中体现。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在社会转型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中国现阶段所进行的经济层面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人们原有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打破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诚然,社会经济层面的变革必然反映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将会引起社会政治价值的变革。可以说,政治价值的变革根源于经济层面的变革,两者正是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实现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政治价值的变革汹涌激荡,它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变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变革呢?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这也就是说,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是上层建筑自身的变革,而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因为作为人们意识和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层建筑不可能进行自我规定,不管它多么规范、完美,多么合乎逻辑,只能由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性质、状况和客观要求来规定。但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始终处于一种矛盾运动之中,两者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它只能在其经济基础所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许的范围内建立起来。同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力量,上层建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发挥着一定的反作用。可见,在社会转型期,要考察中国政治价值的变革,必须首先考察经济层面的变革;而政治价值的变革能否顺利进行,将直接关系到经济层面变革的最终实现。因为当政治价值的变革适应经济层面的变革时,就会推动经济层面的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延缓经济层面的变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推动政治价值的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应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较为顺利地推进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层面的变革。但是,当我们为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欢呼雀跃时,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就是,我们在确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并没有真正适时、有效地推进政治价值的变革,导致原有的政治价值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有效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我们注意到,由于侧重强调一元、整体和应然的原有政治价值体系,不能与强调多元、个体和实然的市场经济实现有效对接,所以需要建构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价值体系,以发挥政治价值的规范、推动和调节作用,最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由于政治价值的变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其变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变革的速度。应该说,当前我们尚未建立起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适应的政治价值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政治价值进入集中

生发期。这样,不同政治价值之间必然发生碰撞、冲突、排斥和融合,在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力已经不断弱化的情况下,各种政治价值必将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出现所谓的“诸神之争”^①的局面,其最终将导致社会政治价值的危机。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一个社会整体的深层转型,只有扩展到价值观这个层面时,才有可能完成和实现。”^②因此,为避免政治价值危机的出现,我们就需要通过政治价值层面的变革,建构一种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被广大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治价值体系。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价值体系呢?如何对现有的政治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我们当代人的“政治价值使命”。

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全部人类政治生活的最终目标。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所要探讨的是人类现实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理想政治生活的终极规范。因此,人类的政治生活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价值的引导,其始终受着一定的政治价值的支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对政治价值的追求。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在《人的系统观》一书中指出:“在客观事实和价值观念之间、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存在

^①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页。

^② 赖传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

着一条遍及一切的深沟。”^①这就是说,价值不同于事实,价值和事实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虽然两者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却是难以逾越的。因此,政治价值不同于现实政治生活,两者之间的界线也是难以逾越的。即使这样,两者仍然可以在一定的张力下实现统一。但是,当政治价值难以对纷繁芜杂的现实政治生活进行有力解释时,就意味着政治价值已经与现实政治生活严重脱节了,推进政治价值的变革就成为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政治价值研究没有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致使其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理论研究的意义上说,这种状况不利于政治价值理论的发展,难以为政治价值体系研究提供丰富、充足和可靠的知识积累,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和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如伊斯顿所说:“政治研究工作缺少可靠的知识以及系统地表达其见解的方式……缺乏比较可靠的知识这一点,直接起因于过分忽视一般的理论。”^②可见,政治理论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一切政治研究工作的起点。加强政治价值理论研究,是深刻理解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政治价值体系研究的内在要求。建构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价值体系,就是要弥合政治价值理论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裂痕,最终实现两者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具体来说,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

要对现实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回答,没有政治理论的指

① [奥]贝塔朗菲、[美]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② [美]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6页。

导是不可能,因为“只是堆积事实而没有理论的指导只会导致大量收集无意义的事实”^①。所以,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不在于进行政治事实的收集,而在于通过对政治事实的分析、抽象和概括,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政治理论体系。政治理论能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个经验化的知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理论能否发挥对政治生活的规范、引导和评价作用,依赖于其自身的成熟程度。虽然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人们面对枯燥乏味的理论研究时,常常避而远之,以致伊斯顿不禁感言:“理论已经越来越远离政治研究的主流”^②。

诚然,政治价值理论研究的滞后,除受到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弱化的状况影响之外,还与政治价值理论自身的特点有关。因为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价值理论是最困难、最含糊不清和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③。所以,价值理论的这一特点,导致其不能为政治价值理论的基础研究提供准确、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而直接影响着政治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基于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提出了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一些规范性概念。政治价值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阐释这些概念,揭示它们对人们政治生活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人们政治行为的深刻影响。

但是,政治价值理论研究的浅泛、欠缺和不系统,使我们难以真正把握这些概念,从而难以真正地了解和认识丰富多彩的现实

① [美]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② [美]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页。

③ [奥]贝塔朗非、[美]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政治生活。对此,伊斯顿指出:“今天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认识到,只有澄清了研究工作主要的理论前提,才确实有可能用科学方法了解政治生活。”^①所以,在社会转型期,进行政治价值体系建构就被赋予了重大而实际的政治价值理论建设意义,即它首先承载着进行政治价值理论阐释、研究和创新的历史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价值理论成熟、完善的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政治生活本原意义的理解和认识的程度,将直接指引和规定着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将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理想政治生活的基本构想。因为“作为最后一着,起决定性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如果生活的目的、指导的观念或生命的价值已经衰竭了,那么军事机器,包括最先进的超级炸弹也挽救不了我们。这是由历史变迁中得出的几个稳妥可靠的结论之一。”^②

虽然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出来的,但是精神不是物质,物质不能代替精神,“在一个技术时代里精神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③,物质上的富足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富有,两者不是完全等价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越来越相互背离,两者相统一的裂痕越来越大:我们在物质上日益富足,然而我们在精神上却越来越贫乏。这就是人类社会发 展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悖论,也是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所在。

随着时代的进步,物质和精神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一方面,

① [美]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1页。

② [奥]贝塔朗非、[美]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③ [奥]贝塔朗非、[美]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相异化,物表现为人的目的,人成为了物的附属物。在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却日益贬值,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另一方面,物质的力量超越了精神的力量,物质开始不断吞噬精神,使精神日益萎缩。这意味着“人身上起主导作用的、对抗自身自然欲求之无序的核心力量在减弱,意味着忘记了目的高于单纯手段的施展”^②。这种人的精神上的没落现象,将直接导致人们对原有政治价值认同性的急剧下降,最终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认同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体系,来抵御现实物质力量的侵蚀,以避免整个时代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现实任务。因为“只要一个团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显露出最为强烈的相互认同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面临建立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来理顺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任务。”^③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转型。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将是原有政治价值体系不可避免的混乱、无序和解体,将是其功能的缺失、弱化和无效,将是其结构的错位、失衡和断裂。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② [德]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3页。

③ [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540页。

因此,为避免整个时代的覆灭,我们就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原有的政治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建构,也就是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进行创造性建设。

二、相关研究文献检视

政治价值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和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史就是人类不断探索和追寻政治价值的历史。纵观中西政治思想史,以一些具体的政治价值观念为研究对象和思考旨趣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总的来说,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一些具体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内涵、特征、类型和功能等相关内容进行论述。而将政治价值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以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建构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屈指可数。这无疑是一个亟须进行弥补性和开创性研究的领域。

(一) 国外相关研究

虽然早在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的萌芽就已经在西欧出现,但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前,将政治价值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政治价值及其体系建构进行相关研究,并未引起西方政治学者的注意。所以,对这一领域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到17世纪中叶,为适应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一些西方政治经济学者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力度逐渐加大。但是,将其与政治价值结合起来,对政治价值及其体系建构进行研究,依然未能得到西方政治学者的足够重视。虽然有一些政治学者对市场经济与政治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有所涉及,但

是其研究相当零碎,仅限于一般性论述,而且往往杂糅在政治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之中,不成体系。至今,这一状况仍然未有大的改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西方政治学者一般将政治价值放到政治文化范畴内进行研究,而不是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这使得政治价值研究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进而限制着政治价值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其次,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由于受到这一研究范式的影响,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西方政治价值与其他非西方政治价值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经过长期发展和理论积淀,西方政治价值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其强大的政治规范、政治引导和政治整合作用,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社会危机。因此,对政治价值进行研究,仅仅是后发展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阶段,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反映,西方政治价值体系已经相对完善,无须再进行深入的选择和建构研究。鉴于以上原因,西方政治价值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着手以政治价值研究取代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但是政治价值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①显然,西方政治价值研究的这一状况,不利于我们把握其研究脉络。这里,仅就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简

^① 参见 Jan-Erik Lane & Svante Ersson, *Culture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5, pp.257-287.